

马峰：印度尼西亚华文小说的柔性叙事 3

。当然，她故意隐藏自己的身份，除了个人经历的不堪回首，更显出对自我社会身份的不认同。她有意摒弃个体的社会身份，这也导致其族群身份的模棱两可，或者说有模糊化的杂糅身份。如果将其视为原住民，这体现了原住民面对华族时的开放姿态，愿意保持交往，却又坚守神秘，在开放中又表现出不自在。如果将其视为华人，则意味着华族传统文化在本土社会的游离、自卑与封闭。华族男子的召妓行为成为自我污名的象征，因此代表族群文化纯洁性的女子只有选择离开，有种文化不容玷污的决绝姿态。

在白放情数量庞杂的爱情小说里，古典兴寄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不过，即使古典寓意并不浓郁，有时还是会显出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以及文化意象。在古典意境里，人们并没有走出“寂寞”的心境。华人借古典文化慰藉边缘身份的寂寞，让传统文化在族群堡垒中滋长。虽然古典之路并不切实，但是却显出文化传承的姿态。

三、书写中国的疗愈策略

在印华新文学初创期至国家独立前后，背井离乡的华侨对故国无限眷恋，他们书写家乡故土更像是一种忠诚意识的表现。在双重国籍问题解决之后，尤其是华文封锁之后，对于印尼华人而言，“书写中国”实际上已属于“书写异域”的范畴，或者说是一种“中国想象

(或异域想象)”。在新世纪依然书写中国题材，其寓意显然已与政治身份毫无瓜葛。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其超然本土之外都表露出一一种创作姿态，有种华族堡垒的自我营构之嫌。就南来北往的流动类型来说，大体可分为南来文人、北归华侨、旅居华人三类。其一，阿五写于1948年的《逸子》表现了水土不服的南来文人。逸子是上海圣约翰的高材生，她爱好交友且诚恳热情，后来远嫁印尼侨生富家子弟乔治。然而，丈夫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恶习，她百般迁就却受尽屈辱。“他爱我，也需要我，但不能让我有半点自由。他说，祖国来的应该牺牲一切去适应在这边生长的……”最后，逸子毅然打破地狱般的婚姻生活，选择回归祖国故乡。侨生与南来文人貌合神离，实际上代表了旧客对新客的压抑排斥，而南来文人间的友谊则显得格外温情真挚。其二，许也许的《飘渺地天堂》是对北归梦碎的殇悼，表妹与恋人为了梦想而回国，但是“文革”让他们从“天堂”跌落。其三，茜茜丽亚的《梦的终站》写到华人的短暂旅居。女主人公只能在香港异地重温浪漫的情人旧梦，在印尼本土却勾起创伤与纠结。“当她返回雅加达，当她披上嫁衣的那一刻，一切将如梦幻般消逝结束；化为以泪水欢笑，辛酸甜蜜镶成的记忆。”在爱情的世界里，仿佛投射了现实世界中的华族寓言，在摇摆不定、扑

朔迷离、彷徨焦虑的生命状态里，这些人物在印尼本土抑或中国故土都有种无处安身又难以排遣的苦衷。

在异域想象的作品中，何淑慧的《山雾》最具代表性，它是印华女作家的第一部长篇爱情小说，展现了洛山村的纯美爱恋，有种青春偶像剧的感觉。小说虽然以台湾作为背景，但是将其置换为大陆也并无疏离感，究其根源则在于浓重的中国性。作者的“台湾想象”也可称之为“中国想象”，对于出生并长期生活于印尼的身份而言，这是纯粹有别于本土视野的异域书写。如果从族群角度切入，那么其显在的“华族”色彩便不言而喻，这里的华族早已超出本土华族的范畴。小说创作于台湾，叙述焦点不在台北，而是远离城市的乡村。在风景秀美的山区小村，宛若陶渊明所营造的桃花源，这里没有城市的嘈杂与烦扰，有的是清澈见底的溪流与青翠灵秀的山林，还有那纯朴善良的村民。故事从一对富家子弟到山村度假开始，他们无意中邂逅了表姐妹俩，于是爱情在机缘巧合下慢慢升温。其中，秦思凡出场时便带着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忧伤之美。“她那双柔柔的眼眸，晶莹的仿佛可以渗出水来，她美的很柔、很娴静，就好像是深谷中的幽兰一样，使人忍不住要呵护它、爱恋它。真的活脱脱的是一个如梦如幻的美人儿。”这种外貌描写是典型的古典才子佳人式笔法，两对俊男美

女的姻缘都因误解而历经磨难，结局则是温暖如朝阳的圆满爱情。整体而言，何淑慧的书写风格兼具现代与古典。所谓“现代”，是指琼瑶式言情小说的韵味，一波三折的情节推展始终伴有诗意与唯美。她对诗人情有独钟，其文笔清丽中也不乏诗韵。作品中多次提及徐志摩，在开篇扉页便借《在那山道旁》铺垫，第五章开头也以《问谁》引入正题。比起对现代诗人的专一引用，她对古典诗人的引用则是多家并举。其一，当冉骞看到山间茂林里的清澄如镜的溪流，便不自觉地吟咏起“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这显然将山村视为与世隔绝的理想世界。其二，当紫竹内心被痛楚塞满时，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彰显出其无力无奈的情绪。冉轲还体验了柳永“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的醉后清醒。周丝丝是一家美容院的理容小姐，她重情而不滥情，算是冉轲的红颜知己。正是由于她的开导，冉轲才从逃避现实中清醒，她的形象与柳永笔下的女子情态更有几分神似。其三，对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个别化用。冉轲的论调可堪媲美贾宝玉，他是玩世不恭的情场浪子，但也有忠实与负责任的一面。当他为失恋感到绝望时，便决意抹除珍藏的回忆。他看着紫竹的照片，看着潺潺流水，想到黛玉葬花，于是有了“水葬照片”之举。

作者借着台湾体验而沉醉于“文化原乡”，然而当她回归印尼，这种文化光影却显得格格不入。不论华人个体还是华族群体，遥远的异域想象美好却虚幻，终究无法疗愈本土现实的艰难与痛楚。

四、华人族群的本土反思

印华作家的本土书写具有一定的纪实性，而在爱情小说中所关注的华族堡垒也真实透露了当地华人的生存状况。印华社会中的女性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小说中不乏凸显本土女性不屈从的性格以示对命运的抗争的，也有诠释女性追求理想婚姻的迫切之情的。然而，在真实生活中往往事与愿违，女性自身所受伤害极深。时过境迁后，有者悔恨终身，有者得偿所愿，有者孑然一身，无不透着女性对婚姻的自我抉择。同时，男权社会的传统陋习也受到批判，不少作品对其劣根性表现不屑与鄙视，借此谴责婚姻不幸的肇事者。再者，华族过分追求物欲的迫切心态也引发华社问题，极不利于男女感情的自然发展，也牵涉欺骗感情的诡诈行径。当然，也有的强调了情感真挚的两性和谐与纯真爱情，体现反思情感的高尚思想。总的看来，印华作家对本土爱情的呈现复杂多面，而纠葛丛生的两性关系则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如揭露耽于情欲、情感背叛、伦常失序等人性的丑恶。对于情感阴暗面的大量书写，一方面呈现了华人